

中国女书与史前陶文

探源中华文明八千年

Chinese Female Scripts &
Prehistoric Inscription on Pottery

Seeking the Sour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ith Eight Thousand Years

李荆林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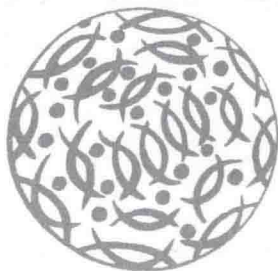
中国女书与史前陶文

探源中华文明八千年

Chinese Female Scripts &
Prehistoric Inscription on Pottery

Seeking the Sour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ith Eight Thousand Years

李荆林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女书与史前陶文：探源中华文明八千年/李荆林著.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6.8
ISBN 978-7-5035-5044-7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女书—研究 ②陶文—研究—中国—上古 IV. ①H123 ②K877.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2506 号

中国女书与史前陶文：探源中华文明八千年

责任编辑 周 慧 徐浩昂

版式设计 李 灵

责任印制 宋二顺

责任校对 王 微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 话 (010) 62805830 (总编室) (010) 62805821 (发行部)
(010) 62805034 (网络销售) (010) 62805822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288186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67 千字

印 张 26.375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8.00 元

网 址: www.dxcbs.net 邮 箱: cbs@ccps.gov.cn

微 信 ID: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新浪微博: @党校出版社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

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

——习近平*

* 习近平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的演讲。

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

——恩格斯

我想我大概还不至愚蠢到这种地步，以至于会把我在这些难题上的结论看作是最终的结论。我已一再改变我的观点，只要证据有了变化，那么我也就会下决心改变我的观点。就如同变色龙那样，需要随着它爬行的小径色彩的变化去改变自己的颜色。

——J. G. 弗雷泽



李荆林，从事文博考古工作近四十年，曾任广东省珠海市博物馆馆长。
著有《女书与史前陶文研究》及论文若干，《中华国宝大辞典》主编



著名史学家李学勤先生与作者在一起，2015年6月于北京

序

李学勤*

珠海市博物馆李荆林先生这部著作，虽然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却讨论了中国历史文化中两个重要谜团：一个是全国许多地点发现的史前陶器刻划符号，一个是迄今仍在湖南江永一带保存的女书。

有趣的是，这两个谜团的开始出现几乎是同时的。史前陶器上面的刻划符号，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1930—1931年，中央研究院与山东省政府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在城子崖进行发掘，所获有龙山文化及更晚的带刻划符号陶片，发表在1934年出版的报告《城子崖》中。江永流传的女书，首先得到介绍，也是在1931年。该年出版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上册，记述了永明（今江永县）花山的这种奇异文字（赵丽明主编：《中国女书集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31页）。

尽管陶器刻划符号和女书在20世纪30年代初已经被发现，两者都长时间遭到冷落，没有多少人注意和研究。关于女书的第二种文献，系1959年的《江永县解放十年志》，不过是流行不广的油印本（史金波、白滨、赵丽明主编：《奇特的女书》，第294页）。调查、研究女书热潮的兴起，则迟到1983年以后。陶器刻划符号的再研究，以1963年出版的《西安半坡》报告为导线，60年代末70年代初，郭沫若、李孝定等先生先后提出半坡仰韶文化陶器符号是文字的见解，揭开了一系列热烈讨论的

* 李学勤教授，系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等。

序幕。

史前陶器刻划符号和女书的研究，都遇到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前者来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些符号是不是文字？如果是文字，它们应该怎样释读？它们和后世的文字有没有关系？或者说这些符号后来是否继续发展？对于后者来说，它们是文字，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目前还有人能读能写，并且在一定场合中使用女书。这里存在的问题刚好与陶器符号相反，它们的历史能上溯到什么时候？它们有没有前身？如果有，那又是什么？

陶器刻划符号中很大一部分是由线状的笔划构成的。若干短小的直线，或者曲线，组成一定的图形。有的学者认为这属于中国传统“六书”中的指事，并以指事作为最原始的构字原则。这一观点，与通行的文字始于象形之说很不相同，从而引起不少学者的反对。还有论作鉴于刻划符号中也有主要是象形的，比如大汶口文化陶器及良渚文化陶器、玉器上的符号便是这样，于是主张中国文字起源有指事、象形两种传统的二元说。

女书也是用许多短小的直线、曲线等组成文字的。这种文字采用怎样的构字原则，很值得探讨。假如上述史前陶器上面的类似符号确是文字，有没有可能也是采用这一种构字原则呢？这是极富于启示性的思考方向。

李荆林先生这部书，就是这样把陶器刻划符号同女书这两个看来似不相干的研究课题联系起来了。他以详细的论证，提出两者实际是衔接的。刻划符号是女书的远祖，女书是刻划符号的孑遗。这是崭新的思维，也是作者长期研究的成果。

在最近给我的信中，李荆林先生说：“关于女书起源，苦苦寻思五年，不得要领。反复肯定，又反复否定，今终于找到一条可圆其说的说法。……女书证明史前刻划符号是文字符号，是目前我国最早的文字（陶文）；反之，陶文亦证明了女书的起源时代。我是这样认为的。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他的态度是很谦虚的。

我曾经多次谈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用分析商周文字的方法和知识去释读陶器、玉器的刻划符号，只是一种试验。以女书所体现的

构字原则去看陶器符号，乃是同样有着可能性和价值的试验。读者从李荆林先生这部书里可以看到坚持这种试验的探索精神。在此我们应该指出，科学需要探索，也必须探索。

1995年6月于北京昌运宫

再 序

李学勤

珠海市博物馆李荆林先生的专著《女书与史前陶文研究》，初版系在1995年，我曾为之作序，距今已过20年了。其书现又增订再版，要我再赘言几句，适值我因小恙做了一个小手术，处于半卧床状态，但看了他的文稿，觉得还是应该有所表示，不能辜负这项工作。

李荆林先生新版补加的第八章，篇幅不多，然而要点是把文字的起源问题进一步与文明的起源联系起来。这是很重要的，可谓书中研究的一项进展，有益于读者。

我常说，文字是人类最大的发明之一，没有文字，人们的一切文化创造在空间上不能传播，在时间上也不能承续，所以没有文字的文明是不会存在的。虽然如此，目前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古埃及等古代文明国家，文字究竟如何萌生起源，都还是在研究探讨之中。李荆林先生这本书，正是有关探究的一种努力。

我在初版序中，说过史前陶文和女书是两大谜团，这两者有其共同点，就是均系由线条构成，而没有图画形状，如作为文字的原始形态，是与长时期流行的文字始自图形的学说相违背的，而同1972年郭沫若先生《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指事早于象形之说有相近之处。

应当承认，在1995年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国际文字学界已经有了反对文字始于图画的新学说。大家知道，人类文字始出于图画这个模式，占据统治地位已经多年，国内许多学者遵循的格尔伯《文字的研究》(I. J. Gelb, *A Study of Writing*, 1952) 即其代表。1992年，美国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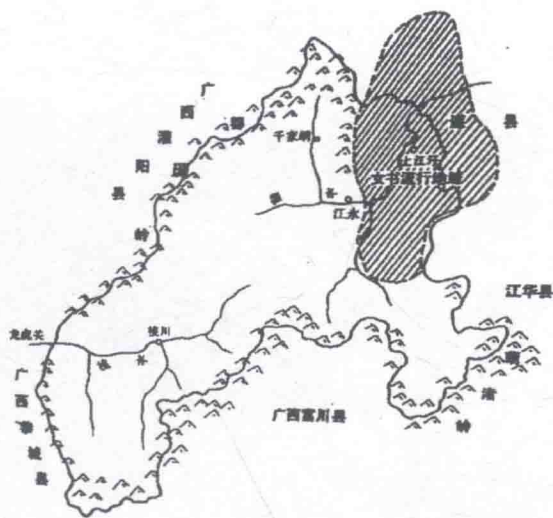
者白瑟拉托的《文字之前》(D. S. Besserat, *Before Writing*) 问世, 以大量的材料、翔实的论证, 说明原始文字并非都出于图画, 堪称定论, 这一点可供关注李荆林先生书的读者参考。

2016 年 5 月 11 日

于北京清华园



湖南省江永县政区图



女书流行地域示意图



湖南省江永县县城一隅



女书流行地湖南省江永县浦尾村



女书流行地湖南省江永县桐口村



1988年作者在湖南省江永县桐口村调查女书，
与女书传人义年华（1907—1991年）老人在一起



两位女书传人高银仙（1902—1990年）与义年华在一起



女书传人义年华老人在写女书（1988年作者摄）



女书传人高银仙老人在看女书（1988年作者摄）